

## “侮辱是在忍受者的心中”

這故事發生在七十年代末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戰爭博物館鄰近的 Campbell 小學。我的女兒 Leta（洪理達）和 Hanson（洪漢生）當時都在那所學校上學。這是當地最好的公立學校之一。伊麗莎白女皇到訪該校時，有一張媒體的像片，還照到小 Hanson 坐在草地上，對著英女皇，顯出又好奇又欣賞的神態。

一天下午，Leta 放學回來跟我說：“媽媽，我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一本書，說中國人偷東西”。我當時還不以為然，心想可能是她沒看懂。我就讓她把那本書借回來給我看。第二天她回家后對我說：“媽媽我找不到那本書，給別人借走了”。我於是讓她繼續等，等書還回圖書館再借。后來她終於借到了那本書，帶回家給我看。我一看完了這一篇，就從椅子上跳起來，馬上打電話給學校的校長 Morris 先生。

那篇作品叫“Christmas at Shamrock Hotel”《Shamrock 旅館的聖誕節》，是一篇獨幕話劇。作者是澳大利亞女名作家 Kylie Tennant。這話劇的故事發生在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期，主人公是一個單身女人。她有一間旅館，旅館門前擺了一個大的木板廣告，寫著“出售：50 英鎊（For Sale: 50 Pounds）”。但是很久都沒有人過問。有一天，她在廚房準備聖誕餐的時候，對著窗口，看見有個中國人在

她后院拿走了一塊磚頭（澳洲很多房子的后院都沒有圍牆）。他就自言自語道“我真不明白那個 Chinaman\*，為什麼要拿走后院的磚頭，有什麼用呢？”\*（這是個複合詞，重音在前，輕音在後）。

過了不久，有一個無業游民漫步過來了（大概還唱著 *Waltz Matilda*），旅館的主人就邀請他進來共享聖誕餐。為了表示感激，這無業游民就幫著旅館的主人磨刀以便切火雞。在磨刀的過程中，他發現磚頭裡有金砂，就很興奮地告訴旅館主：“哎呀！你這磚頭裡有金砂呢！”。主人就說：“真的嗎？哦！原來如此！那個 Ching-Chong（輕視語）偷我的磚頭就是為了這些金沙。”過不多久，拿走磚頭的那個中國人帶著他的親戚朋友和 50 英磅來了，想要買下這旅館。可是結局是旅館主人和那無業游民各自拿著一根 Cricket 板球球棒來付款的中國顧客和他的親戚朋友一個個打下場，幕下。

我在電話上對校長說：“校長先生，我的女兒在學校看到了 School Journal 有一篇 Kylie Tennant 寫的話劇，你大概也看到了吧？我想這作品不應該登在小學的雜誌上，也更不應該放在圖書館吧？”我接二連三地問了他幾個問題，他都很有禮貌地回答“是的，Fincher 太太”，“是的，Fincher 太太”，回答了半個小時的 **yes!** 我就問他，“我想把這件事放在每月舉行的家長與老師的校務會議程上。”他馬上就說：“哦！我想沒有這個必要吧。你跟我說就行了，你放心，我會去辦的。我們不需要驚動家長校務會。”我接著說：“Morris 先生，您是位通

情達理的先生，我很感謝您願意處理這件事。但是能說服您只是一個人而已，這問題牽扯到整個校區和所有的學生。把這個放在校務會議程上主要是為了要讓其他家長也重視這件事情。”但他仍堅持他要自己去辦這件事，尤其不要驚動別的家長。我聽他的口氣和態度是下了決心不把這件事的影響擴大。我就很失望，認為這件事必需要我自己承當去辦。於是我就給學校理事會的每一位理事打電話。雖然也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有較多人認為把這個放在議程上並不礙事。

開會的那天晚上，討論到議程這一項的時候，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我非常驚訝地看到校長 Morris 先生第一個站起來發言反對我，他說“請各位翻到這學報的某某頁，上頭有一篇說西班牙人毀滅了印加土著的文明。要是我們學校裡有西班牙人的話，他們的家長是不是也都要來找我們麻煩”。我很氣憤他說話沒有信用，就說：“校長先生，我非常傷心也非常遺憾，現在已經沒有印加土著人可以出來替他們自己說話了！我之所以要把這件事提出來，是為了讓我們這一校區的父母們提高警覺，不要讓半個世紀之前發生的事再重演。”當時我突然想到莎翁說的話“Beauty is in eyes of the beholder（美麗是在觀看者眼中的）”，我就脫口而出：“侮辱是在忍受者的心中感覺到的。您既然不是被侮辱者，您怎麼能知道他們的感受呢？”校長接著說：“Kylie Tennant 是澳洲很有名的作家，我們要鼓勵學生們閱讀她的作品。”我就接著說：“她的著作有不少，為什麼偏偏要選這一

篇登在小學的雜誌上？即使要登載，也應該有編者在重印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寫個“編者前言”說明當時的歷史背景，告訴小讀者我們的社會已經前進了，不再是當時那樣了。尤其是這種埋葬在半個世紀之前的廢物，為什麼偏偏要把它挖出來？為什麼新南威爾士州（New South Wales）教育局還要把它登在小學的書報上。這不是要存心毒害我們孩子們的心靈嗎？”當時除了我先生 John Fincher 和別的家長外，其他所有的老師們都在場，我自然要盡可能不得罪他們。但在這種義不容辭的情境下，我只好硬起脊椎去據理力爭。幸虧理事會裡有一位理事也站起來說他同意我的看法。他領養的韓國小女兒也曾回家哭訴說她在學校被人譏笑為 Ching-Chong。這種譏笑就像現代流行的社會事件“Bullying”。新聞上登載有些孩子甚至大人因為被人家 Bullied 而自殺。

在后來的投票中，我們就以一票之差險勝。憑著這一票之多，學校理事會就必須以他們的名義寫信給新南威爾士州教育局，去抗議這篇文章的刊登，並要求改進以後編輯的理念。這封信還被轉發到新南威爾士州的所有學校（堪培拉隸屬於新南威爾士州）。手握著這封信，我就信心滿滿的去和聯邦移民局交涉，移民局的局長對這件事很有同感，馬上一口答應，還感謝我們給他提供了這個案例。當時因為社會上有眾多關於移民的爭論，所以聯邦政府指派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ANU（我任職的大學）太平洋研究所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去研究當時種族歧視的問題。於是我又去找了那位教授，他也答

應要寫信給新南威爾士州教育局。正好那一年，我正好當選堪培拉華人協會的會長，理所當然，我們也開了一個關於這件事的討論會。王賡武先生的太太是我們這個協會的秘書，她替我們總結了討論的內容，寫了一封信，也寄給了教育局，表明我們華人社區的態度和訴求。到此，我們聯合了四個關鍵組織，一起向教育局施壓力，這團結的力量果然見效。教育局答應從此不再登載此類對少數族裔存有侮辱性的文章。

這件事結束之後，有一位堪培拉中學學生的母親打電話給我，說她非常感謝我們替大家伸張正義。因為她女兒有一天回家哭著跟她說，她的老師讓她演這出話劇裡的中國人，她女兒不願意。但是直到我們這件事之後，她的老師才答應不讓她演。這是我們努力所得到的一些看得見的成果。雖然現在澳大利亞種族關係比以前好多了，但我們還要提醒自己，不管在任何環境下，想要改善我們的處境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只是坐在那裡對自己人埋怨是無濟於事的。這是我們這次成功的經驗。

二十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，美國發起的越南戰爭所造成的大量難民，因為沒有陸地可退，絕大部分都是乘船逃命的。他們所乘的小船都經不起大浪，不少人喪生大海。還有更多不幸的，是被海盜搶劫後拋棄在海裡的。這些陰魂包括我家的親表哥陳景春，表嫂和外甥女阿妹。那慘不忍睹的悲劇過了不久，有個香港的電影“投奔

怒海”，非常寫實而動人心腑。它就是拍這些東南亞難民逃難的悲慘故事。這影片確實值得用來做歷史教材，監製人是世界聞名的演員夏夢。我 79 年第一次到海南島時，咦？看到街上怎麼那麼像越南西貢！原來這些都是“投奔怒海”電影隊留下的外景記錄。這些難民大部分都移民去了美國，加拿大，或澳大利亞。(據說這部電影中國大陸不准放映，因為那些情景太像“文革”了)

香港因為九七回歸的問題，也有很多人移民到加拿大，澳洲，美國等地。再加上當時台灣雖然也是世界經濟四小龍之一，但也有很多人移民去澳洲的，這幾波移民潮匯聚起來，再次引發了澳洲輿論對於“黃禍”（Yellow Peril）的恐慌。當時墨爾本大學有一個知名澳洲史教授，叫 Prof. Geoffrey Norman Blainey, 他被任命為那時的澳中理事會主席 Chairman of the Australia-China Council。可是有一天，他竟然以澳中理事會主席的身份在 ANU 澳洲國立大學發表演說，整篇發言提出了各種理由說明澳洲為什麼應該停止接納亞洲移民。他講完之後，我的先生 John Fincher 就問他：要是明天澳洲的報紙頭版登出這個標題“澳洲中國理事會主席警告全澳黃禍即將降臨”（“Chairman of Australia-China Council Warns of Another Yellow Peril”），這是你要表達的意思嗎？Blainey 教授就理直氣壯地，從他的口袋中拿出了演講稿說“我是有備而來的。”類似反對亞洲移民的事件屢見不鮮。

但作為華人，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專門給華人看的報紙《星島日

報》居然刊出一篇社論，題為《莫把馮京當馬涼》，（我把它翻譯成英文“Don't take a Ford for a Lincoln”）。這社論是在說明澳洲並不反對所有華人，只是不想讓低知識，少錢財的華人進來。這社論引起當時絕大部分的華人氣憤，尤其是不久前來自東南亞的華僑更是義憤填膺。因此就在他們聚居的一個市區，聯合起來，抵制《星島日報》。各商店都拒絕代售。過了幾天，《星島日報》只好在頭版發表聲明，說那篇社論是香港擬好的稿，並未經過他們同意就登出了。

事實上，這件事件也說明華人社會，不但不能團結起來為大家做事，反而要“窩裡斗”。被人家排斥的時候還要分三，六，九等，似乎自己就是高等華人“馮京”，而別人才是不受歡迎的“馬涼”。憑這個來表示自己是特殊階級，而不介入輿論。

上世紀 30 年代，魯迅批評中國人的“阿 Q 精神”和老舍批評的“莫談國事”已經快一個世紀了，這種觀念和態度應該去除了吧？移民社會的問題相當複雜。不僅要看世界的局勢和當地政府的政策，還要看移民自身的反省以及社區內部的作為。要放眼看世界和國家，更要看自己的認知和社會參與。

過去傳統的華僑都要“落葉歸根”，像我的祖父洪澤華和祖母洪陳氏那樣，抗戰勝利后就回去閩南老家。可是，現在世界各地的華僑都是要“落葉生根”的。像我父親洪石山所說“我們都是在這裡生長

的筍，就算把它砍了，還是會在這附近繼續長出來的。”